

跨体系边界与跨历史实践

——雅克·朗西埃的“文学性”

臧小佳

摘要: 本文自西方“文学性”之发端起探讨,进而阐释雅克·朗西埃的“文学性”所涉及的美学、诗学、政治、历史之间的跨体系边界之关联。本文论证之目的首先在于厘清朗西埃“文学性”概念之基础与变迁及其所代表的界限,以说明朗西埃的“文学性”经历了跨历史实践之后的现代意义。

关键词: 文学性; 政治; 雅克·朗西埃; 可感性分配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4-0063-06

全球化并未形成文化上的“一体化”,尤其是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更因全球化的进展而需要追其根源、观其互动与察其共同的“跨历史”与“跨文化”视界,同时也要求直面多重形态的跨体系视野。在不同文化的接触中,文学无疑总是处于前沿,以其敏感反映文化动向。有鉴于此,以跨体系的视界或从不同文化领域切入“文学性”的讨论,既可作为对世界性文学话题的积极回应,也能为不同观点和立场提供严肃交流的路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预言:未来国际社会的主要冲突是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我们则试图证明,文学理论的发展与阐释,必然导致文化的多元解读,同时跨体系边界与跨历史实践亦不可避免地成为寻找其中的价值之共同与差异的框架。

现代文学,已不再总被简约为文本、语言或风格,而是“位移”(displacement)为话语秩序、社会功能,或知识的诗学、感性的分配、审美的体制,以及美学的政治等论题,这一位移与现代“文学性”概念及其“旅行”不可分割。英美新批评学派、法国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都曾先后提出与俄国形式主义相异的“文学性”概念;就空间上的欧

美、俄苏,或“东方”而言,对“文学性”的发展与关注也不平衡。因而对“文学性”这一母题的探讨,愈来愈具有跨文化、跨体系和跨历史向度。本文从法国理论家雅克·朗西埃的视角来检视“文学性”,试图处理以下三个问题:“文学性”概念的基础与变迁,现代“文学性”概念所代表的界限,以及以跨体系思考为特征的朗西埃的“文学性”,在经历了跨历史实践之后所呈现出的现代意义。

一、“文学性”的时空旅行

学者们通常认为,“文学性”概念是率先由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 1896—1982)于1919年提出。雅各布森提出“文学性”概念的背景,产生于俄罗斯形式主义学派理论探索的需要和语境,目的是给文学规定其疆域、确定其研究对象,将文学建构为一种自律的“文学科学”:“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①,即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条件。然而迄今为止,文学史家的做法与警察相似,为防万一,则逮捕所有嫌犯,把凡是在房间里遇到的人,甚至从路边经过的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雅克·朗西埃跨体系文学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8YJC752043;西北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基金招标项目“‘一带一路’跨文化研究”,项目编号:SKJJZ2018003。

作者简介: 臧小佳,女,四川成都人,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从事跨文化研究、现当代文学理论、哲学、美学、翻译研究。

行人都一律拘捕。文学史家就是这样无所不用，诸如个人生活、心理学、政治学、哲学，无一例外。这样便凑成了一堆雕虫小技，而不是文学科学，仿佛他们已经忘记，每一种对象都分别属于一门科学，如哲学史，文化史、心理学等等，而这些科学也自然可以使用文学现象作为有缺陷的次要文献。”^②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也是在斯拉夫文论的第一个黄金期，关注“文学性”理论的主要是俄国“形式主义者”，他们为终结传统文学研究领域之方法论的混乱局面，提出明确规定文学研究的疆界，并确定其研究对象的诉求，以将文学研究与外来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史之类的学科分化。雅各布森也强调：“文学学的对象不是文学及其总和，而是‘文学性’，亦即使特定作品成其为文学作品的那一特性。”^[1]

除雅各布森外，在捷克还有以批评家扬·穆卡若夫斯基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的“结构主义”文论，在波兰，有罗曼·英加登的“现象学文论”。可以说，罗曼·英加登、扬·穆卡若夫斯基和罗曼·雅格布森这三位学者的名字，在现代斯拉夫文论中“文学性”学说发育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但在彼时，这三位理论家都很少关心“什么是文学性”这一概念的界说，更多地专注于“文学性”何以生成，即考察文学研究的路径。因此乔纳森·卡勒有言：“关于文学性，我们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定义。”^[2]

“文学性”作为现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概念成为20世纪文学研究的核心术语，是现代文学理论最重要概念之一。如爱德华·赛义德在1982年《理论旅行》一文中提出“理论旅行”之说，后又在《理论旅行再思考》中所强调的理论变异与时空变动之关系，“文学性”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理论旅行中，具有不同旨趣、不同用途以及不同的批评意识。根据赛义德的理论，“文学性”进入话语，在穿越时空时，“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在新时代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某种程度的改造”^[3]。这一理论旅行见解似乎描述了“文学性”在不同的时空和历史情境中的移动以及命运变化。

例如，“文学性”这一命题于近20年来进入

当代中国文论语境，产生了不同版本并引发了诸多不同讨论与解读。从钱佼汝的《“文学性”和“陌生化”》，史忠义的《关于“文学性”的定义的思考》到周小仪的《文学性》等，从对西方“文学性”的概念关注和不同注解，到对其形式特征的普遍探索，以及对“文学性”的诗意阐述，或是利用“文学性”创造性地解决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矛盾等等，我们可以从“文学性”的中国旅行中，反思在特定历史和空间下的、既具有普遍性又带有本土性的文化实践^③。

“文学性”跨越着历史，在许多不同的传统和理论渊源中汲取营养，丰富着其意义层次。因其关乎文学的宗旨与使命，关乎对文学学科边界的圈定，也是现代文化与社会应当面对的基础问题，是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者不可悬置的首要问题，对“文学性”的追问也必然是当代文学的轴心环节和基本关切。法国当代理论家雅克·朗西埃将关乎“文学性”的视野放置在跨体系边界与跨历史实践研究中考量，同时他所涉猎的诸多研究主题与例证也都借助着“文学性”的概念，并借此构画一种新的“共同体”议题。

二、朗西埃的“文学性”

“文学性”一词首次出现在朗西埃的著作，是1995年出版的《歧义：政治与哲学》（*La Mésentente: Politique et Philosophie*, 1995），该书实为一部政治理论著作。在更早的关于“历史书写”（*l'écriture historique*）的著作《历史之名》（*Les Noms de l'histoire: Essai Poétique du Savoir*, 1992）中，朗西埃的关切重点是字词与名字在诗学层面的差异：他将历史看作是一个“为主体命名的书写方式，建立名字与主体的关系……命名所建立的主体与名字的关系是不确定的，不论在叙事规律或科学规律上，都难以被完全的确立”^{[4][2]}。在《历史之名》第三章“字词过度”

（*L'excès du mots/ The excess of words*）中，朗西埃以*excès*（过度/越界）一词指出对词语既定说法的偏离，预示了某种带有政治意味的“文学性”探讨之端倪。当然，在《历史之名》中，朗西埃使用的还是“文学特性”等术语。其实，朗西埃多次在不

同框架与语境中(如历史、文学、哲学、政治),运用了“文学性”的相关概念,只是词语状况屡有细微的不同。例如,在其较早的著作《无产者之夜》(*La Nuit des Prolétaires*, 1982)中,朗西埃频繁使用“跨越”“界限”类字词,通过描述“逾越”各种“界线”的“危险少数”(1830年代的法国工人知识分子),因使用偏离了社会阶级定义的语言,而在工人与工厂主之间产生出可互换性的模糊关系,导致造成“阶级尴尬”的现象。我们可以将这种实践看作是朗西埃意欲从对历史与政治的关怀,通过字词的观点转向“文学性”的尝试之试探,即“将异端的历史问题,转向了异质性的历史书写问题”^{[4]19}。

在《歧义:政治与哲学》(*La Mésentente: Politique et Philosophie*, 1995)中,朗西埃将“文学性”定义为“词语在三个层面上超越了它们所命名事物的‘界限’:其一,相对于词语所命名的事物而言;其二,相对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要求而言;其三,相对于交流的模式而言,这一模式使得既定社会秩序合法化并将之巩固^{[5]171}。”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朗西埃对“界限”的关切与强调:文字一旦越“界”,就会将原有社会空间分配变得不再稳固。因为词与物的关系塑造着经验的可感知领域,当词语超越了既有社会经验和等级秩序之“界”,就会成为对社会秩序、社会模式、社会角色和社会位置进行再分配的先导因素。

文字的越界必然将和朗西埃所谓“做事、存在和说话”的方式联系起来,因为在他看来,“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条件之“文学性”,其实就是在竖立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内有一套可感性分配(*partage du sensible*)的体系,也是一种等级制度,只要文学通过词语为事物赋予意义,只要“物”能承载明确的意义,“事件、词语的状态以及现代文学生产的体制全都可以在‘文学性’的概念之下来分析……”^{[5]167-168}。

在回答“何为文学”的问题时,朗西埃曾通过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伏尔泰、布朗肖,或是对巴尔扎克、福楼拜、普鲁斯特、马拉美等作家的讨论,将文学问题首先论述为由一系列“矛盾”构成的文学概念。伏尔泰曾提出,文学的“矛盾性”显

现为“不确定性”,它含糊不清且意味着断裂,是“物体和词语之间确定的关系秩序的断裂,说话方式、做事方式和生存方式之间的断裂”^[6]。因此,一旦词语突破规则约束,言语行为可以不再对特定的人言说,文学便走上了它的现代意义轨迹,朗西埃正是在这一变化的轨迹中,开始探寻文学的新准则与再现的旧秩序之间的关系,以及新准则本身的内在矛盾。在这一探讨的路径中,“文学性”概念始终作为边界及实践伴随左右。

三、政治语境中的“文学性”

19世纪文学作为纯文学(*Les Belles-Lettres*)通过对古典再现机制“共和”秩序的解构,日益演变为某种矛盾诗学,带着伏尔泰所谓的“不确定性”。文学的新准则与再现的旧秩序之间的关系便是在这一变化中得以明确,并酝酿了新准则本身的内在矛盾^①。当亚里士多德、贺拉斯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所确定的再现法则倒塌时,另一种混乱也随即出现:“文学性在共同体的事物、习惯与态度之间建立的更为深刻的无规则性。”^{[7]132}

在《词语的肉身:书写的政治》(*La Chair des Mots: Politique de l'Écriture*, 1990, 1998)中,朗西埃以一段看似晦涩的论述,表达了这种书写的准则和空间被突破时混乱的产生:“根据这样一种语一言(*langage*)的用法,言语产生于躯体,是一个躯体向另一个躯体演说的对象,它意味着已经被体验的状态,或者有待被执行的行为的状态。所有言语都有完全确定的起点和终点,这样它们就进入了各个躯体在它们自己的场所,用它们自己的功能所做的有序安排。当这个空间被诸个目的不确定的空间穿越、突破时,混乱就产生了。”^{[7]152}

朗西埃想要证明,当言语离开言语在常规状态下的起点与终点,它被某个人说出,却不知道听的人是谁,此时的空间是被重新组织了词语、事物、话语秩序和情景秩序。这一被打乱的、不规则的形态,实则是打乱了等级关系,打乱了柏拉图的“共同体”交响曲,朗西埃的“文学性”之政治意义便于此产生:通过扰乱的语言,书写扰乱了行事方式、存在方式与言谈方式之间的关系,而这三者

在柏拉图看来,是共同体之和谐构建的灵魂。朗西埃把这个不规则形态称为“文学性”,因为它重新剪裁了躯体与共同体规范之间的空间,构画出一种新的地貌或空间,对思想构成了挑战,跨越了体系边界进入另一个共同体的空间,成为“被民主统治的共同体”^{[71]54}。

在说明“民主”的文学性时,朗西埃常以福楼拜为例。在《包法利夫人》中处理农家女的庸常事件时,福楼拜“将自己的句子固定于物品,并形成某种语言石化(pétrification)的形式,进而形成其‘观察事物的绝对方式’——石化后的语言,意味着人类行动及意指(significations)意义的丢失,它不是某种崇高的提升,而是将本来与世界秩序相吻合的诗学等级秩序解体,唯一构成作品核心或是结构的东西,就是‘观察事物的绝对方式’,即‘风格’”^[8]。“观察事物的绝对方式”就是把感官当作纯粹的感性器官来体验,而脱离日常经验的感觉器官,于是农家女艾玛·包法利的情事便成了有价值的事件。福楼拜所描述的“事件”的真正内容是感觉的细节,即感觉的微观层面,在对这一层面的关注中,福楼拜遵循了构成文学的原则——主题无所谓高低贵贱,并进一步将文学的任务演变成对微观感知的记录。福楼拜的这种感知记录是开启现代性的可能方法之一,也是被朗西埃用于摧毁社会—政治等级体系的方法之一——将“文学性”作为“文学的政治”的另一种表述——“民主”在这种表述中,就是一种可感性分配,是一种感性场所的再分配。

通过对现代文学的阐释,朗西埃一方面似乎在着力凸显现代文学与现代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也在“突显新的民主压制(democratic suppression)的社会和政治模型”^{[51]68}。他聚焦于词语与身体的结构特征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试图确认分解词语秩序与身体秩序之间关系的文学特性的现代民主。

朗西埃的另一重要政治术语“平等”,对理解现代诗学革命的影响和意义也尤为关键,甚至可以说,政治的“平等”来到美学范畴,就与朗西埃的“文学性”划上了等号。在政治语境内,我们总是能看到朗西埃的清晰表达——现代是“平等”的时

代,当他对“文学性”概念进行描述时,便将“平等”变成了一条美学分析原则,并不断探索如何在文学语境中理解“平等”的政治价值,或者说,在文学案例中,如何理解“平等”的作用。一系列政治关注点和政治术语正是如此被位移入美学范畴,成为朗西埃关于政治与美学之间关系的思考之边界,如朗西埃在《文学的政治》(*Poli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2007)中,以此思路重新构建了始于1981年《无产者之夜》(*La Nuit des Prolétaires: Archives du rêve ouvrier*, 1981)的政治与美学关系之思考。

在讨论现代文学时,朗西埃强调“文学性”的相关历史框架以及“词与物被分离以及被聚合的方式”^⑤,使现代文学在对词语进行使用时,以强有力的方式为事物赋予了新的关系之可能,也重塑了经验的可感知材料。这一框架赋予“文学性”现代政治的意味,其审美作用就是“政治的”。一旦现代文学借由“文学性”打开现代政治之门,一系列不同问题便从二者边界中渗透进来(同时也产生了朗西埃的一系列关于文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相关概念),例如记录了词语民主化过程中所涉及的诸多因素的“沉默的言语”^⑥,以及朗西埃最早的论题之确立:“现代性中平等作为社会生活的结构性特征”^{[51]75}等。

四、可感性分配与跨历史实践

朗西埃将现代文学理解为他所谓的“艺术的审美体制”的开创者,对这一体制的模棱两可态度,让审美与非审美客体之间的分隔线变得不堪一击。正如现代文学弱化了诗歌与散文的语言区分,也弱化了具有和不具有文学价值的客体之间的区分。同时,也可以推广至弱化艺术和非艺术之间的区分,例如艺术不再必须是美术,或如日常生活被整合进艺术作品。朗西埃也是在这种不牢固的区分中描述了视觉艺术和电影的特点。

在朗西埃游走于每一体系、错综复杂的分析背后,始终存在着一个核心:再现的元素与艺术的美学机制之间的矛盾关系。“文学性”就被用来体现这种具有矛盾性的限囿,这一悖论使文学无法与其

他话语形式区分, 文学不再具备可识别的特征, 使其与其他话语模式进行区别的功能已趋消失。

因而“文学性”既是现代文学本身产生和出现的必要条件, 同时也是使现代文学从艺术的再现机制中解放出来的必要条件。朗西埃将超越艺术的再现机制, 甚至超越艺术领域, 同政治领域中起作用的概念协应 (conceptual coordinates) 和可见性模式共同囊括而形成一种广义美学界定——“可感性分配”。这一概念让他在政治、历史、哲学、美学的边界, 在每一个他所研究的特定对象上, 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可感性分配”决定了行动、生产、感知和思想形式之间的联结模式。不仅现代文学为可感性分配的分配做出了巨大贡献, 政治也首先是作为一种关于可感知/可感受性物质的战斗, 而成为“政治的美学”。在他看来, 文学同政治实践一样, 为感官感知创造了新的条件。如果文学的任务是对微观感知的记录, 那么写作的政治关乎的就是词语可感性分配的方式, 使之可被看见和听见, 就是一种新的经验事物的方式。朗西埃始终强调, 文学的政治并非作家们的政治, 也不是他们所参与的政治, 福楼拜的例子也证明了这一点: 写作的政治与作者的政治倾向无关, 文学的政治不涉及作家们表现社会结构或政治斗争的方式。这一说法假设了作为集体实践形式的政治和作为写作艺术并经历历史确定的制度的文学之间, 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联系。

在乏味生活中寻找意义的学科还有现代历史, 朗西埃也试图挖掘其中的文学原型和资源, 他以米什莱为例。米什莱作为现代历史实践的代表人物, 将历史中的“新主题”的陈述归属于艺术的审美体制: “它想要说出它所描述的时间、事物及人物, 并且想要弥合过去与叙述之间的沟壑。”^{[5]184}在米什莱的笔下, “历史学家的乌托邦变成了文学终结的乌托邦”^[9], 与福楼拜一样, 米什莱将经验变得可见, 让陈旧的可感性分配变得晦涩。米什莱所开创的历史实践, 展示的是历史的沉默主题, 是无声见证的世界, 他一方面利用了超越边界的“文学性”特点, 让这严肃历史被解读为“对象与工具的世界, 日常的事件, 身体的使用与日常的行为”^{[4]120}, 一方面又否定了它们, “因为这种实践

破坏了那些被剥夺者和沉默者的能力, 有了这种能力他们就能创作自己的言论”^{[5]185}。朗西埃借米什莱的例子, 批评了现代历史实践的审美体制如何在即将接纳“文学性”时又迅速停止, 由此再次证明, 历史学家和现代文学中的作家一样, 逃避着他们的作品所揭示的平等。

我们认为朗西埃之所以将文学界定为写作 (écriture/writing) 的跨历史实践, 是因为写作孕育了人类个体与共同体不安的文学——即“文学性”; 同时, 朗西埃也在文学的本质, 将文学作为一种怀疑的艺术, 即受到质疑的文学的本质, 并将文学作为问题去回答时, 使其成为一系列的矛盾——文学的、历史的、政治的、美学的矛盾。朗西埃在每一个例证中, 都借助了“文学性”概念的批评功能, 让文学发生位移, 以质问对文学、历史、政治、哲学中的文学性话题的处理方式。

朗西埃起初将其平等理念和解放行动的执着运用于社会和政治议题, 后转向文学与艺术, 用现代文学证明了写作可见性的历史模型, 他创造性地以“文学性”命名新的知识诗学, 并提出了有关从美学到政治、从政治到美学、文学的政治、诗学的政治等新课题。从朗西埃的“文学性”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美学、诗学和文学的跨体系语境和写作的跨历史实践中, 被充分解释的现代政治的“文学条件”。可以说, “文学性”在朗西埃的理论中, 不但被用作文学批评工具, 也能够成为政治批评的工具, 且两者之间有内在关联; “文学性”不仅仅是分析的工具, 也是用来锻造文学、历史、哲学等文学一话语原型所使用的批判性反思的术语。因此, 朗西埃的“文学性”命名了一种新的知识诗学, 描述了一种新的感知美学机制, 已不完全是雅各布森的“文学性”术语的概念, 而是揭示其潜在概念, 即对每个人言说的无序倾向之写作扰乱了稳定的社会规则。朗西埃的“文学性”不只是关于美学, 也是现代版本的诗学的政治、文学的政治, 同时更指明了现代政治的文学条件。由现代“文学性”概念带来的美学标准与文化政治思辨, 及其在理论上所展现的突围性, 在我们面对当代各种美学问题时, 都是重要的借镜与启迪。

注释

- ①该术语在1950—60年代被欧美学者引进, 英译为literarity或literariness, 法译为littérarité。原文为literaturnost, 据说是雅各布森根据列宁的partignost(党性)一词, 结合该词的上下文语境“党性决定文学”的论调所创的新词。
- ②出自雅各布森《晚近俄国诗歌》, 在其中的第二节的第二小节中, 俄文为“литературность”(文学性)一词, 见, Jakobson, “Новейшая русская поэзия”, Selected Writings. Vol. 5. Hague, Paris, New York: Mouton, 1979, pp. 305-6。关于俄文“文学性”概念及词义的讨论, 参见: 胡涛, “雅各布森与‘文学性’概念”, 《外国文学研究》, 2014年第三期, 第37-45页, 或张汉良, “‘文学性’与比较诗学——一项知识的考掘”, 《中国比较文学》, 2012年第一期, 第19-34页。雅各布森这段关于文学性的论述翻译版本众多, 这里主要参考: 茨维坦·托多罗夫, 《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 蔡鸿滨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 第24页。本文作者对引文部分文字有一定修改。学者在引用此“文学性”出处时, 通常引至警察逮捕嫌疑的比喻之前。但这个比喻其实暗含了雅各布森年轻时因为说德语而在路上被警察逮捕, 让“文学性”这个词汇从一开始就涵盖了某种潜在的政治文本。
- ③有关中国文论界对“文学性”的追问与构建, 可参见: 周启超, 《跨文化视界中的文学文本/作品理论——当代欧陆文论与斯拉夫文论的一个轴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年, 第82-85页。
- ④这一观点的部分讨论可参阅笔者已发表的论文: 臧小佳, “沉默的抵抗与精神的在场——论雅克·朗西埃的文学‘沉默’观”, 《南京社会科学》, 2017年第九期, 第

126-131页。

- ⑤这一观点多次出现在朗西埃的不同论述中, 如《词语的肉身: 书写的政治》《历史之名: 论知识的诗学》等。
- ⑥参阅: 雅克·朗西埃, 《沉默的言语: 论文学的矛盾》, 臧小佳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

参考文献

- [1] V. 厄里希. 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学说[M]. 张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255.
- [2] 乔纳森·卡勒. 文学性[M]//马克·昂热诺, 等. 问题与观点: 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 史忠义, 田庆生, 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27-44.
- [3] Edward W.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226-227.
- [4] 雅克·朗西埃. 历史之名: 论知识的诗学[M]. 魏德骥, 杨淳嫻,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 [5] 让-菲利普·德兰蒂. 朗西埃: 关键概念[M]. 李三达,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8.
- [6] 雅克·朗西埃. 文学的政治[M]. 张新木,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5.
- [7] 雅克·朗西埃. 词语的肉身: 书写的政治[M]. 朱康, 朱羽, 黄锐杰, 译.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
- [8] 臧小佳. 沉默的抵抗与精神的在场——论雅克·朗西埃的文学“沉默”观[J]. 南京社会科学, 2017(9): 126-131.
- [9] Jacques Rancière. Short Voyages to the Land of the People[M]. J. Swenson, (tra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99.

Cross-System Boundary and Cross-History Practice ——Literariness of Jacques Rancière

Zang Xiaojia

Abstract: Explored from the origin of Literariness in the West,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connections of cross-system boundary between aesthetics, poetics, politics and history involved in the literariness of Jacques Rancière. And this paper intends to clarify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 of the literariness of Jacques Rancière and the boundary it represents in that to illustrate its modern significance after cross-history practice.

Key words: Literarity/Literariness; Politics; Jacques Rancière; Division of the Sensibility